

中国公众对媒体涉统计报道的信任机制研究

周芷悦¹ 闫浩轩²

1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100000；

2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北京，101117；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国内公众如何看待媒体对统计数据的报道。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的认知、态度以及理解程度的数据。研究发现，公众对媒体关于统计数据的报道整体持正面态度，但存在一定程度的保留和误解。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对统计数据的解读和报道方式直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态度。大部分公众依赖于媒体报道来获得统计数据，并对统计数据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但仍有部分人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有所疑虑。研究还发现，不同年龄、教育背景以及媒体使用习惯的群体在看待媒体对统计数据的报道时存在差异。因此，媒体在报道统计数据时应注重准确性、透明性和公正性，同时加强公众教育，提高公众对统计数据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媒体报道；统计数据；公共信任

DOI：10.64216/3080-1486.25.10.048

引言

统计数据作为量化现实的重要工具，是政府决策的科学依据、市场运行的风向标，也是公众理解社会现象的基础。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核心渠道，对统计数据的报道不仅深刻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与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经济增长率、就业数据，还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感染率，媒体对统计信息的传播质量直接关系到社会共识的凝聚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尤其在数字化时代，数据的高频更新与快速传播进一步放大了媒体的桥梁作用，使其成为连接专业领域与大众认知的关键纽带。

统计数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信息爆炸时代下，统计发布主体多元化，导致话语权分散，数据来源混杂且相互冲突；公共信息（如基尼系数、房价数据）因私人信息泛滥和多方矛盾解读失去公信力，公众陷入信息迷思；受众被分割为利益或兴趣导向的小众部落（如“月光族”、政府官员），群体间观点对立，加剧话语接受的分歧；统计体系内部方法不统一（如多部门发布同一指标的不同数据），进一步削弱数据的一致性和可信度。^[1]

媒体报道也常因多种原因陷入误区。一方面，信息简化需求与专业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导致断章取义、过度解读等现象频发。例如，脱离原始语境片面引用数据，或将相关性强行解释为因果性，都可能扭曲事实本质，引发公众误解。另一方面，部分媒体为追求传播效率或流量效应，倾向于强化数据的冲突性、戏剧性，甚至通过选择性呈现制造认知偏差。很多所谓“事实”在技术

上是正确的，但是被有问题的理解和沟通方式扭曲了，包括选择性报道、忽略背景和夸大重要性。这些做法被不少媒体从业人员认为可以接受，甚至一些科学工作者为了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意无意地借鉴。^[2]此外，统计术语的误用、可视化图表的设计不当，以及缺乏对数据局限性的必要说明，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信息接收障碍。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媒体的公信力，也消解了统计科学的严肃性和统计从业人员的公信力，可能对个体决策和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学术界对公众如何看待媒体及统计信息的研究已形成多维视角。一些研究关注媒体和统计机构的受信任程度。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受媒体形式、机构属性、历史信誉、群体特点和议题特点等多重因素影响。公众对统计机构的信任也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既与制度设计的独立性与透明度有关，也有数据质量、媒体合作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3]已有研究分析了我国政府统计公信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并未将统计宣传工作中的不同环节做单独分析。^[4]处于统计信息传播链条上的机构，享受的公众信任程度可能有天壤之别。一项对英国统计公信力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官方统计机构的信任程度很高（超过 80%），但是对政府宣称的和媒体报道的统计数字信任程度很低（不到 30%，媒体甚至不到 20%）。^[5]如此悬殊的差距并非任何一方的福音；相反，它向整个统计宣传工作提出了尖锐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把统计工作的高公信力转化为统计宣传的高公信力。在公众认知高度复杂的今天，这一问题日

益需要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调查,系统分析国内公众对媒体统计报道的感知与信任程度的差异,试图为理解公众信息行为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为媒体优化数据传播策略、政府部门完善信息沟通机制提供参考依据。这一探索不仅有助于弥合专业知识与公共认知之间的鸿沟,也对在信息过载时代构建更具包容性与科学性的公共话语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1 方法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法,在“问卷星”平台上发放和收集问卷。在2024年2月至5月间,共收集到274份答卷,其中有效答卷249份,有效率90.87%。样本人群中男性94人,占37.75%,女性155人,占62.25%。年龄上,20岁以下的占12.05%,20-29岁的占31.73%,30-39岁的占44.18%,40岁以上的占12.04%。受教育程度以大学本科或专科为主,占77.51%,研究生占8.03%,目前在高中及以下的占14.46%。在受大学专科以上教育的213人中,专业在人文社科商科类的占55.40%,在理工农医类的占44.60%。

2 分析

问及什么因素对信任媒体统计报道影响最大,超过70%的样本人群选择媒体形式(纸媒/广播电视/网媒)(73.49%)和媒体过往信誉(71.08%)。由于我国的报纸和广播电视的管理制度,以及长期作为最权威政府喉舌的发展历程,相比作为新形态,官方声音和民间声音更纷杂的网络媒体,纸媒和广播电视的信息平均来说报道更严肃,可信度也更高。在我国,官方账号信任度高过民间的个人账号信任度,这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网民对官方账号权力维度的信任产生的,而不是建立在媒介专业维度基础上。^[6]但是在本研究中,媒体属性(官办/民办)(67.47%)仅排在第三位,说明公众对媒体“出身”并不如过往研究中发现的那样给予最高的重视。媒体受众数量(40.56%)影响较小,说明流量或普及度并非信任核心,甚至可能因“流量至上”导致反向质疑。这说明国内公众对媒体统计报道的信任是一种基于制度的信任,是主要建立在信源可信性(source credibility)和媒介可信性(media credibility)上的。^{[7][8]}

考虑到媒体的多样性,研究询问了三种媒体分类在公众的信任度上的差异。53.82%信任国内媒体多于国外媒体,40.56%认为两者差异不大,反映公众在统计信息方面并没有给国外媒体赋予更多的信任。61.85%信任行业媒体多于大众媒体。29.32%认为两者相当,反映专业

领域报道的精准性和深度被认可,大众媒体可能因泛化或娱乐化削弱可信度。66.67%信任主流媒体多于非主流媒体,30.12%认为两者相当,这与前面的信任构成要素是一致的。从产生方式而言,媒体信任可分为制度信任、属性信任和过程信任。人们对己方阵营媒体的信任感较高,对对立方阵营媒体的信任感较低。尽管媒体信任并不主要基于过程信任,但是基于过程的反复接触有利于信任的强化和巩固。这种反复接触往往通过反馈来实现。在新闻生产和消费中,这种反馈通过报纸订阅、电视收视率、节目或频道订购等来体现。受众的反馈需要得到媒体的回应,由此产生基于过程的信任。^[7]多项研究都显示,公众高度信任和重视政府官方的声音。政府官方媒体在科学传播中有着市场化和商业媒体无法企及的优势。这是非形式逻辑认知模式在中国国情中的积极作用的体现。^[9]当突发事件发生时,青年网民的媒体信任偏好与日常情境明显不同。青年网民对官方媒体的信任度、偏好度最高,70%的青年网民认为官方媒体值得信任;相比于日常情境,官方媒体偏好度显著提高。^[10]

断章取义(57.03%)、过度解读(56.63%)和曲意误导(55.02%)在媒体统计数据报道的突出问题中位列前三,反映公众对数据“选择性使用”和“主观加工”的高度敏感。数据造假(42.57%)和标题党(40.56%)紧随其后,显示公众对恶意操纵和吸引眼球行为的警惕。对所选择问题的普遍性,合计51.81%的样本人群认为在至少大部分媒体中存在,其余48.19%认为在至多一半媒体中存在,说明公众并未陷入全面否定的情绪化评判中。

问及统计数据呈现形式与信任程度的关系,58.63%的受访者表示统计图和数据表格会增加对统计报道的信任,38.55%表示没有影响。对专家解读的态度,60.24%表示它可以增加信任程度,但有12.45%的人表示反而会削弱信任程度,比统计图表造成的反效果要高得多,显示了在公众中不可忽视的对专家影响公众认知的抵触情绪。如果在不同媒体上看到同一事项的不同统计数据,51.81%会“多看主流媒体”,25.7%选择自主查证,16.47%等待他人分析,显示公众依赖主流渠道的信息整合能力,主动批判思考可能因时间成本或能力限制而无法实施。

3 什么人更重视媒体的统计报道质量?

基于对媒体统计数据报道质量的不同重视程度,受访者可划分为两类群体:一类认为报道质量对于媒体信任“特别重要”(G1),占样本群体的49.40%,另一类认为“能说明一些问题”(G2),占47.39%。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两类群体在性别分布上呈现显著差异,但在年

龄和受教育程度上无显著差异。G2 女性比例显著高于 G1 (68.64% vs. 56.10%), 相应地男性比例显著低于 G1 (31.36% vs. 43.90%)。G1 人文社科商科背景占比高于 G2 (59.05% vs. 50.49%), 反映出该群体对数据权威性的内在需求可能更高, 与其学科实践中依赖数据支撑社会议题分析的倾向相关。

两类群体在数据获取渠道与信任构建机制上呈现对立倾向。G1 对主流媒体 (75.61%) 和国内媒体 (60.98%) 的信任度显著高于 G2 (差异分别为 17.98% 和 14.37%)。这种“权威依赖型”信任逻辑与其对媒体过往信誉 (78.86% vs. G2 的 64.41%) 和官方属性 (72.36% vs. 64.41%) 的重视一致。反观 G2, 其通过学者或研究机构获取数据的比例显著高于 G1 (56.25% vs. 33.33%), 且更关注媒体形式 (74.58% vs. G1 的 70.73%), 表明其信任构建依赖于专业独立性与传播形式的适配性, 符合实用主义导向的信息处理模式。数据呈现形式对两类群体的可信度评估影响显著。G1 更依赖统计图 (67.48% vs. 52.54%) 和表格 (68.29% vs. 51.69%) 的结构化呈现, 且更重视文字详实性 (53.66% vs. 45.76%), 表明其需要规范化、可追溯的数据形式以降低认知负荷。而 G2 对文字简练的接受度更高 (44.07% vs. 37.40%),

且对专家解读的依赖度较低 (59.32% vs. 64.23%), 暗示其更关注核心数据的快速提取与多源对比, 而非深度解读的权威性。

尽管两类群体均将数据准确性 (G1: 85.37%; G2: 76.27%) 与全面性 (79.67% vs. 79.66%) 列为关键要素, 但其侧重点存在本质差异。G1 对数据详实性 (53.66%) 的高需求与其主动验证行为一致, 而 G2 对简练表达 (44.07%) 的偏好则契合其效率导向的信息处理模式。这一差异进一步印证了两类群体的核心分野: G1 追求“绝对可信”的完整证据链, G2 则倾向于“相对可用”的实用主义平衡。在媒体报道问题的感知上, G1 对数据造假 (46.34% vs. G2 的 37.29%) 和断章取义 (60.98% vs. 54.24%) 的担忧更为突出, 反映出其对数据质量的“零容忍”态度。这种敏感性驱动了其主动应对行为: 24.39% 的 G1 受访者选择“公开批评”虚假报道, 显著高于 G2 (10.17%), 且更倾向于自主查证数据矛盾 (29.27% vs. 21.19%)。相比之下, G2 对标题党问题关注度更高 (44.92% vs. 38.21%), 并更多采取“彻底拉黑”媒体 (28.81% vs. 25.20%) 或依赖主流媒体整合信息 (61.02% vs. 44.72%) 的被动策略, 体现其对信息效率与风险规避的权衡。

表 1 媒体统计报道质量重视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

差异维度	认为高质量统计报道对信任媒体非常重要 (G1)	认为高质量统计报道对信任媒体“能说明一定问题” (G2)
信任核心因素	媒体过往信誉, 依赖历史表现	媒体属性 (官媒/自媒体), 重视官方背书
数据来源信任优先级	政府部门, 制度权威优先	学者或研究机构, 专业共同体优先
媒体报道问题认知	对数据质量敏感性高	对信息效率与风险规避的权衡
信息处理模式	需要规范化、可追溯的数据形式以降低认知负荷	更关注核心数据的快速提取与多源对比, 而非深度解读的权威性

4 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如何看待统计报道?

对学人文社科的样本人群, 在问及什么因素最影响他们对媒体统计报道的信任时, 把最多的票投给了媒体形式 (77.12%), 媒体过往信誉 (75.42%) 和媒体的属性 (官媒/自媒体) (67.80%)。对学理工农医的人群, 从高到低的排序则是媒体的形式 (77.89%), 媒体的属性 (74.74%) 和媒体过往的信誉 (65.26%)。人文社科背景的人们对媒体过往信誉更加重视, 而理工农医背景的人们更在乎媒体是官媒还是自媒体。问及最信任的统计数据来源, 人文社科专业背景的人最信任政府部门 (76.27%), 其次是学者或研究结构 (74.58%), 而理工农医背景的人刚好相反, 最信任学者或研究机构 (75.79%), 其次是政府部门 (71.58%)。尽管媒体信任的主体是基于制度的信任, 但基于属性的信任却是媒体信任中更为坚实的类型。基于属性的信任能够提高信任产生的程度和信任关系的强度。^[7]当在不同媒体上看到同一事项的

不同统计数据时, 人文社科背景的人比理工农医背景的人更愿意等着看别人的专门分析 (18.64% vs. 10.53%), 而后者更愿意多看几家媒体, 寻找主流看法 (63.16% vs. 49.15%)。

在人文社科背景的人看来, 好的统计数据报道应以数据准确最优先 (81.36%), 其次是数据全面 (80.51%); 在理工农医背景的人看来, 应以数据全面最优先 (84.21%), 其次是数据准确 (75.79%)。问及媒体统计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人文社科专业背景的人将问题按严重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为: 断章取义 (63.56%), 过度解读 (58.47%) 和曲解误导 (53.39%)。理工农医背景的人排序为: 过度解读 (55.79%), 曲解误导 (54.74%), 断章取义 (44.21%)。看到媒体上对统计数据的有误甚至虚假的报道时, 人文社科背景的人更愿意不公开地提出反馈 (41.53%), 而理工农医背景的人更愿意彻底将该媒体拉黑 (33.68%)。

从学科训练的角度来说, 人文社科群体可能更关注

形式背后的叙事逻辑（如深度报道与碎片化信息的差异），而理工科群体则更重视形式的技术规范性（如数据可视化、实验证据的呈现方式）。人文社科研究者通常更关注社会关系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累积性与互动性。他们倾向于认为媒体信誉是长期公共沟通制度的产物，体现为风险社会中的“确定性”承诺。理工科背景的群体通常更依赖制度化、结构化的权威体系，倾向于通过媒体属性的官方性来快速判断信息可靠性。官媒作为国家权威的延伸，其属性本身即被视作制度合法性的表征，而自媒体的非官方属性则可能触发对信息源可靠性的质疑。这种判断模式符合技术理性思维，即通过分类简化复杂的信息验证过程。学科认知范式的差异亦需纳入考量。人文社科研究常涉及话语分析与批判性思维，对媒体历史行为（如议程设置偏差、报道伦理）的敏感度更高，故更依赖信誉评估；而理工科强调实证与可验证性，倾向于通过属性标签（如官媒的行政背书）快速锚定信息可信度，这与科学共同体对“同行评议”“机构认证”的依赖具有同构性。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揭示了国内公众对媒体涉统计报道的信任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众对媒体统计报道的信任主要建立在信源可信性与媒介可信性之上，媒体形式、过往信誉及官方属性是影响信任的核心因素。尽管公众整体对统计报道持正面态度，但对数据的选择性使用、主观加工及传播效率与专业性的矛盾仍存疑虑，反映出信任的复杂性与条件性。不同群体在信任构建机制上存在显著分野：“权威依赖型”群体更注重制度信任与数据规范化呈现，而“实用导向型”群体则倾向于效率优先与多源对比，学科背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差异——人文社科群体更关注媒体信誉与社会叙事逻辑，理工科群体则依赖属性标签与技术规范性。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媒体统计报道的公信力需兼顾准确性、透明性与传播策略的差异化：主流媒体应强化数据溯源与专业解读，政府部门需完善信息沟通机制以弥合专业性与公共认知的鸿沟，而公众教育应针对不同群体

的认知特点展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多样性，探索动态信息环境下的信任演变机制，并深化跨学科视角，为构建科学、包容的公共话语空间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 [1]张仲梁. 碎片化语境下的统计话语权[J]. 统计研究, 2011, 28(09): 13-18.
- [2]David Spiegelhalter, Trust in Number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Volume 180, Issue 4, October 2017, Pages 948 - 965
- [3]Tim Holt, Official Statistics,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Trust,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Volume 171, Issue 2, October 2008, Pages 323 - 346.
- [4]黄子晏. 中国政府统计公信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6, (17): 87-89.
- [5]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2017) Public confidence in official statistics.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Available from <http://natcen.ac.uk/our-research/research/public-confidence-in-official-statistics/>.)
- [6]张洪忠, 何苑, 马思源. 官方与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信任度对社会信心影响的中介效应比较研究[J]. 新闻大学, 2018, (04): 98-107.
- [7]Zhou, S., & Yan, Y (2015). Media credibility research: Origin,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3, 255 - 297.
- [8]苏振华. 中国媒体信任的来源与发生机制: 基于 CGS S2010 数据的实证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24(05): 51-68+127.
- [9]吴琦来, 魏哲远, 张瑞楠. 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与信息接触、媒体信任——关注非形式逻辑认知的全国性问卷数据分析[J]. 科学与社会, 2021, 11(04): 117-137.
- [10]杨江华, 王辰宵. 青年网民的媒体使用偏好与政治信任[J]. 青年研究, 2021, (04): 1-10+94.